

黄荷凤院士：我的百岁恩师王曼先生

作者：writer 来源：科学网

本文原地址：<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41932.html>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黄荷凤院士：我的百岁恩师王曼先生。



王曼（前排左一）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合影。



王曼（左）在翻阅黄荷凤（右）的论文。

■黄荷凤

王曼老师100岁了。

我和她结识已逾40年。1977年12月，我走进高考考场。1978年2月，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命运已经悄悄给我安排了一位影响一生的恩师。

王老师在医院时有个响当当的名号——严主任。这个严不是凶，是严格——她对病历书写、手术操作，甚至查房时的站位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容不得半点‘差不多’，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盯着你的，让你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王老师是文革后第一批取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大学毕业那年，我如愿考上了王老师的研究生，1989年拿到了妇产科硕士学位。从此，她成了我医学路上的指路明灯，一照就是一辈子。

王曼老师正式的研究生有6个，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值得一提的是，从她开始，到我们这一代，再到学生，学生的学生，已实现了五代同堂，桃李满天下。如此薪火相传，是师承，也是王曼老师的人格魅力使然。

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

第一次听王曼老师讲她的身世，是在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

的故事。可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

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本该是书香门第的安稳人生，却被战争碾得粉碎，父母相继去世，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战火没给她留下多少童年记忆，却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学医。

她说，那时的想法很朴素：人总要生病，生病了总得有人治。于是，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大师，还选了妇产科这个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的专业。王曼老师常跟我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50年，王曼从医学院毕业，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短缺。没有犹豫，她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出发前几天，她特意找到当时同在杭州的哥哥，拍了一张合影。她说，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

后来，手术队没有奔赴前线，而是作为后方被安排在山东兖州。她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进了外科手术队，在第15野战医院为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手术。

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备课，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科课。王曼说。

当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再苦的处境也拦不住这个人想做事。

1974年，王曼被派往西非马里进行医疗援助。马里条件艰苦，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王老师白天看病，晚上就整理病历、做调查。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留给后来的医疗队。

马里蚊子成灾。她晚上写东西时，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对着腿和脚吹。她大腿关节的病根，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我后来做生殖医学，每次在实验室熬夜、攻克难关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做记录的王老师的形象。

后来，我的学生阮恒超、黄夏娣、陆秀娥也先后援助马里。孰料马里突发政变，时局动荡。她们说，每当遇到困难，一想到王老师当年都能扛过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在老同事们的印象里，王老师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不喊累。她的儿子陈钢常说：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我每每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没错，这就是她。

陈钢或许不知道，当年王老师怀孕七八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到了孕后期，她担心术中自己子宫收缩导致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打一针，让子宫安静下来。就这样，一针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都觉得心疼，又感到震撼。

一个做事顶真的人

王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刻在骨子里的顶真。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身为院长的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培养方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这让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

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觉得太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长大。

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一次一个年轻医生被问到患者的血红蛋白数值，翻了翻病历才回答。王老师没发火，只说了一句：病人躺在这里，她的命在你手里；你不记住她的数值，谁记住？

这句话，比骂人还重。

还有一次，我向她汇报产妇25岁结婚，她立刻打断我，严肃地纠正：错了，是26岁！我当时有点蒙，心想这也太较真了吧，25岁、26岁有多大差别？可她的表情告诉我，在她这里，没有差不多。她常说：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那时论文是用方格稿纸手写的，改一遍就要誊写一遍。数据表述不够精准，要改；逻辑链条有跳跃，也要改。一处数据的偏差、一个论证的逻辑漏洞，都被她用红笔圈出来。她一遍遍地改，我一遍遍地誊抄。如此竟改了十几遍！废稿纸摞在一起，恐怕得数米厚。我后来常开玩笑：我现在指纹锁经常按不开，肯定是当年誊抄太多，把指纹磨平了。

论文答辩时，她更顶真了。为了确定答辩委员会成员，反复斟酌、几易其人。我觉得她过于操心，后来才明白，她的标准很简单，每一位委员都必须对我的课题方向有深入的了解，能在答辩时提出真问题，能帮我把研究再往前推一步，而不是走个过场。

正是这种磨，磨出了我骨子里的严谨。后来我做了老师，才真正理解她的顶真。医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从医数十年，无论是面对复杂的疑难杂症，还是主持国家级重大课题，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

同时，王老师也让我明白：真正的托举，不是替年轻人铺一条平坦的路，而是帮他们搭一座能走得更远的桥。

一个温润善良的人

王老师有一样特别让人敬佩的本事：她虽然厉害，但总能让身边所有人都感到舒服。

她医术好是出了名的，更出名的是她那种让人心甘情愿跟着走的凝聚力。我们这支队伍，无论彼此性格多不同、研究方向多分散，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原因无他，就在于王老师凝聚着我们这群人。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王曼老师身上自带一种优雅和体面。

我的学生杨小福说：王老师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是冬天，也喜欢穿裙子。所以我每次去拜访她，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可能就是这种影响，我们团队的人都很注重仪表。

去年我们去病房看她，她知道我们要来，早早换上漂亮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端坐着等我们来。我看到她，心里又酸又暖。哪怕在病床上，她也要以最好的样子面对学生。这就是她的体面，也是她对生活的尊重。

王老师治学严苛，待人却十分慈爱宽厚。我的师姐徐乐凤回忆起王老师，总是很动情：每逢过节，老师总会热情邀请我们学生登门小聚。席间亲切闲谈、关怀备至，像家人一样牵挂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倍感温馨。

这种家的感觉，是我们师门一直没断过的情感。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学生一起去看望王老师，如果身在外地，也一定委托学生代我前往。这于我而言，就像回家。

去年教师节，师门第五代弟子申雪知第一次见到祖师奶奶。回来后特别兴奋：老教授特别儒雅，相处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眼睛特别有神，整个人神采奕奕。她握着我们的手，给我们讲以前的故事。聊起学生的时候，能看得出来她打心底里喜欢、疼惜自己的学生。

王老师常教导我们：要把病人当亲人。这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她懂得病人的每一分焦虑，也接得住家属的每一次慌乱。

我听师姐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妊娠四个月合并子宫肌瘤的孕妇，检查提示肌瘤较大需手术治疗，而一旦手术，胎儿很难保住。那天，满脸泪痕的孕妇被推向手术室，在走廊上恰巧遇到了王老师。王老师见她哭得伤心，问主管医生怎么回事。问毕她调来病历资料，站在走廊里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沉吟许久，她拍板决定：暂停手术，改保守观察。

她说，从肌瘤的大小和怀孕时间来看，胎儿仍处于正常发育阶段，可以暂时随访处理。几个月后，这位孕妇成功剖宫产，母婴平安。

我后来问她：当时万一判断失误，可是要担责任的。她说：担责任的事多了，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眼睁睁看着病人失去孩子。

这份医者仁心像一道暖流，流淌在我们五代同堂的血脉中。

我开始带学生后，常对他们说：尽管去善良。这句话，被刻在了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校园的石碑上。每次路过那块碑，我都会想起王老师，想起她在走廊里拦下孕妇的那个瞬间。

一辈子温润善良的王老师，用一生让我们明白：医学不仅是治愈疾病的科学，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和谐共生的一门人心艺术。

一个守正创新的人

王老师的主攻方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当年最困扰女性的疑难病之一。从1982年开始，她就担任全国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协作组牵头单位的负责人。

那是一个没有数据库、没有统计软件、连复印都靠手抄的年代，她硬是汇总了全国8个地区1553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病历，一条一条地分析，一页一页地整理。1986年，她撰写的《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和诊治》发表于《中国现代医学》。1987年，她主持完成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异位内膜特征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她还带着团队研究电脑辅助诊断、异位子宫内膜的超微结构、雌孕激素受体、组织化学、超微细胞化学、药物对内膜细胞DNA合成影响……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那个年代，一个妇产科医生能做出这么系统的研究，靠的就是两个字——执着。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王老师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从没让妇产科三个字把自己框住。

她总是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往外看。她说：医学的进步，很少是在一条路上直直走出来的，多半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撞出来的。所以她支持我们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融在一起，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融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眼界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1979到1980年，王老师干了一件在当时很前卫的事：当时很多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西药治不好、手术复发，走投无路。她就带着大家做研究，用醋酸棉酚做治疗实验，带领妇产科工作者搞中西医结合。一边在实验室里摸机理，一边在病人身上看效果。那时候没有转化医学这个词，但王老师做的就是转化医学。

她让我明白，医生的眼光不能被科室的牌子框住。病人的病是全身的、系统的病，不能只从一个学科的视角去治疗。问题在哪里，眼光就要看向哪里。

后来我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做的就是跨界的事——以前大家关心试管婴儿能不能怀上，我们则是关心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更早得高血压、糖尿病？这仅靠生殖医学回答不了，必须把遗传学、流行病学、生命早期编程的机制都用进来，才能找到答案。

把病人放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做人，这就是王曼老师。

2017年11月，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电话打过去，她在那头停了两秒钟，然后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说了一句话，我至今一字不差地记得：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她高兴，不是有了院士学生，而是她的学生能在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做她当年在战地医院、在马里、在每一个深夜的手术台上做的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报》(2026-09-10 第4版 人物)

作者：黄荷凤 来源：中国科学报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爱科学iikx.com](http://iikx.com)转发